告别功利化的教育

□程福财

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的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上海中学生的成绩，再次雄踞排行榜第一位，赢得广泛赞誉。今年农历新年后，英国教育部副部长率团来上海等地考察，专门学习中国的教育经验。这事在英国引发热烈讨论。

笔者无意对英国教育官员来华取教育之经本身的是非作任何评价，但深感媒体关于英国教育部副部长访问上海的诸多报道中，有两个细节值得特别玩味。第一个细节，出现在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英国教育部副部长在建平中学教室看学生做习题的一张照片上：部长前面一排6个可见面孔的学生中，有5个都戴上了眼镜。在PISA中取得的优秀成绩，和高比例的近视眼之间是否有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确有数据表明，上海学生的近视率，比新加坡、香港和英国这三地同龄人都高出许多。好成绩的背后，是畸高的近视率。高近视率的背后，则是沉重的学业负担。上海学生每周作业时间平均为13.8小时，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7小时，是韩国、芬兰、捷克的四倍多，和其成绩一样雄冠全球。可见，中国学生成绩相对很优秀，但付出的艰辛也很大。从现实的情况看，沉重的学业负担，构成为很多学童不堪承受的压力，有的孩子甚至因此选择逃学、辍学、轻生。

教育本该是让人愉快成长的过程，使人痛苦决计不是办学兴教的初衷。但在一味追求好成绩的路上，中国的家长、教师和学校，显得义无反顾，几近于不管不顾作为受教育者的孩子的主观感受。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没有好的成绩，就没有进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不能进好的学校读书，未来就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找不到所谓的好工作，人生注定将要失败。沿着这个工具主义的单一线性逻辑，育人的工作就是为了追求好成绩、升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受教育者的主观幸福感、人格提升和自我实现，则被束之高阁，轻描淡写。

写到这里，就要谈起关于英国教育部副部长来访过程中出现的第二个值得玩味的细节：部长很惊讶地说她“在和中国学生交流时，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他们说想做科学家”。这个回答让英国的部长震惊，但在中国人眼里却似乎是习以为常的。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教育孩子就是为了他们成功、成大器、成为杰出的社会精英。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恨铁不成钢等流传已久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心理反映。亦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孩子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愉悦、社会责任感的建立等教育本应首先致力实现的目标，往往都被摆放到次要位置。首要的位置，则始终被分数、升学、成大器占据。在很多人看来，教育如果不能把人培养为精英，就是失败的教育。而为了成大器、成精英，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取好分数。这是一个广泛流传的功利化的教育成功学。

经过工具理性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浸染后，这样的教育成功学在当前的中国变得更加突出。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三线城市，胎教行业、早教行业、校外兴趣班与补课行业，都已成为当地的朝阳服务产业而蓬勃发展，相关商业经营者以各种方式向民众灌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论调。各地房地产市场中的学区房价格始终坚挺，每年的升学季节，各种拼爹找关系蜂拥而现，择校成为家长的普遍选择。只可怜，学生就这样没有了娱乐，没有了快乐童年。有小学生因为不堪学习负担，在自己日记本里默默地写道：“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再也不用做作业。”

对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将其归咎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归咎于选拔性招生考试制度的不合理。这种归因固然有其道理，却不尽然。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都是有限度的，但像中国社会这样疯狂追逐分数、追逐名校、追逐成功成大器的教育依然少见。笔者更愿意将此归咎于社会文化和心理观念因素的影响。经历了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和“文革”混乱之后的中国人，在面临尚不够成熟的市场经济时，显得过于急进、浮躁。弱肉强食的市场机制，驱使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拼命成功，生怕落人之后。父辈平庸的，希望子辈出人头地；父辈杰出的，希望子辈延续家族的荣耀。孩子的成功，成为了社会的普遍期待和规范，也成为了教育成功的标准。更糟糕的是，成功的标准，被市场化的、官本位的逻辑界定为考试的高分和升入名校。所有不利于孩子这种成功的学校、教师、教育方法和过程，都会遭遇指责和巨压。一些地区的一些家长不但自己在外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甚至威逼利诱或主动配合老师给孩子提供商业性的课外补课。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教育制度改革注定举步维艰，学校和教师的自主选择空间也被高度压缩，学生的创造性发展空间也遭遇挤压。

实际上，翻开任何一本教育经典名著，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能否成名、成家、成为社会精英，并不是教育的唯一目标。在一个分层化的社会，所谓的社会精英，从来都是少数人等。大多数的人，都注定只是平凡而普通的社会成员。培养一大批平凡但人格健全、有责任心的社会成员，比不计代价逼迫所有的孩子都成为社会精英来得现实得多。更何况，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从来都源自这平凡的大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除了要尝试让人拔尖、出人头地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人善良，引导年轻一代学会接受自我、接受他人、接受社会、学会生活。

中国人向来有攀比的心理。要接受孩子的平凡和普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家长拼命教育孩子、让孩子奋发向上刻苦努力，自然有文化的正当性。但切莫忘记，我们生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的目标，终究是为了他们的快乐和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宁和太平。在这个目标下，教育者的努力，应当要积极认识、尊重、接纳年轻人的个性、能力和主观感受，合理引导他们的发展，尊重他们的天性和潜能，不骄纵也不逼迫他们。只有这样，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才会有更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每一个孩子的自由和潜能发展才更有可能，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也才更有可能。

教育问题谈

艺术与文化重建最需要人文价值

□王文娟

1995年，陕西一民营企业投资2.3亿元人民币，建造了“锦绣阿房宫”风景区。景区于2000年开放，在阿房宫遗址南侧200米处，景区正门前始皇帝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地赫然而立。20世纪50年代朝华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其封面图上面的始皇帝一派狰狞丑恶之面目，那“阶级斗争”场面令人忍俊不禁。但谁能预料到今日秦始皇翻身得解放了。这个景区果然经营不下去，只能拆掉这耗资巨大的盛景大殿。

此情此状，不禁令人想到法国的凡尔赛宫。凡尔赛宫位于巴黎西南郊外的凡尔赛镇。作为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法兰西皇宫，又经路易十五、十六的增添扩建，其建筑气势之辉煌，其各殿各宫室内部装修陈设之富丽，其花园庭院之奇美，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曾随学术考察团旅痕至此，我们流连在迷人的镜厅，驻足在一幅幅巨幅油画前，我们也在有着海神战车雕塑的湖边逗引天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如“锦绣阿房宫”前矗立的始皇帝那样的路易十四们的塑像。他们的金身肉身乃至他们所代表的专制皇权早已被向往自由的民众们打烂，路易十五广场被更名为自由广场。

也许我们真该感谢法兰西这个重新修复的理念，使凡尔赛宫不仅仅成为法国也成为世界人民的博物馆。当把皇宫改为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赏的就不是那个时代王公大人们的骄奢淫逸，而是一件件具有历史保藏价值的器物文化，虽然它们件件都是王宫贵族们奢靡生活的见证，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17、18世纪巴洛克、洛可可艺术的风格样式。当我们过滤了内容，徒留了形式的时候，它们件件都成为了艺术品，这里凝结的审美劳动，就不单单属于皇帝与王公贵族，而是属于创造了它们的民众与历史，这个转换我们早已在美学那里得以解决，而贵族文化的保藏与否与文明延续的关系问题，也早已在春秋之际儒墨相争的后续继承中确立了答案。当墨子攻击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的时候，他并没有理解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深意，而墨子自己的“腓无胈”“胫无毛”的苦行理想也并没有被当时以及后世的人们采纳为理想，儒学却昌盛至今。但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在对待贵族文化时，大多时候却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把火烧掉（如项羽火烧阿房宫）、一杆子打掉（如“文革”破四旧）常常是我们的办法，于是我们丢掉了茶道、花道，没有了汉服唐装。

所以，类似阿房宫这样的重建，越少越好，没有最好。短期效应的景区旅游点设计，全然不管人文价值关怀地让始皇帝的金身耀威扬威地展现，让那些想永葆青春的女士们来云中出岫地劲歌劲舞，实在是可悲与浅薄。

在凡尔赛宫里我就没有看过这样的闹剧，没有看见芭蕾演员在那里尽情演绎宫廷里的奢靡故事，芭蕾恰是那时候盛极一时的宫廷舞，被誉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就曾出演过20多部芭蕾剧。但这些故事都随着路易十五那句臭名昭著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而被人们所唾弃漠视。然而芭蕾这一经典舞种却斐然高贵地走向了世界，人们过滤了其中的矫揉造作，吸纳了她的优美典雅与阳刚美丽。而我们曾经繁华千树的经典古代舞蹈却失传甚久作为文化的一种，作为和古代舞蹈一样价值珍贵的其他文化，今日的重建要靠什么？显然不能靠这样不问人文价值的任意剪辑和拼接。

所以，阿房宫或是其他什么宫，如果需要修复重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重建法，否则，“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劝诫会依然生效。这一失败的例子应该成为警示，相信不只这一例，那些西施故里、刘邦故里、西门庆故里、洛阳城重建的营造者们也一样需要反省。而中外修复重建成功的范例是那么鲜活如许，历历在目，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文化视野

想建“全国第一个村级市”的支书

——电影《卒迹》观影交流对话会纪实

4月22日下午，中国乡村之路——电影《卒迹》观影交流对话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大礼堂举行。制片人张兴援、编剧杨海波、影片导演鲁坚均亮相现场，与现场观众讲述电影拍摄背后的酸甜苦辣。《卒迹》取材于当代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要建“全国第一个村级市”的报道，深受原型人物事迹的感染，主创人员多次赴河南濮阳实地考察采风，对李连成和众多村民进行了深入采访，六易其稿，形成了电影剧本《卒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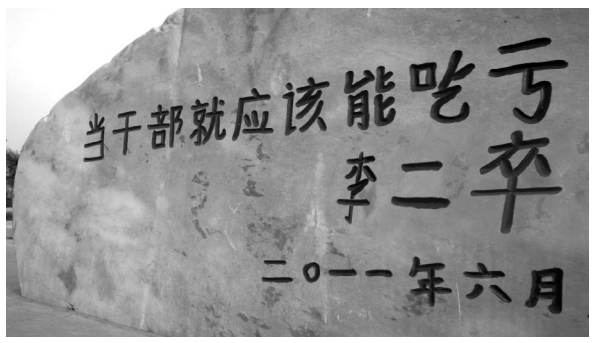
编剧杨海波进行了创作谈：我并未将主人公当作典型与样板人物进行公式化的演绎，而是把主人公李二卒定位成一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草根人物，并形象地把他比作中国象棋中最不起眼的“卒”，并将主人公这种一步一个脚印，艰辛而踏实的“拱卒精神”贯穿始终。李连成所在的西辛庄虽然都姓李，但他家是后搬进村的，在村里面没有任何实力，他在村里是最低的，谁都可以揍他、骂他。我对他第一个感觉，他作为一个“冤种”，到最后能做到村支书，有后来的成绩，从人的本身来讲，有他非常独特内在的力量。为什么我去那里六七次？就是想更全面地了解他内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力量，他怎么使用这种力量走到今天。

李连成这个人非常本色，他一天书都没有读过，但是他为人处事，是有很高智慧的。比如戏里面有个情节，就是当县里发文要在全县推广他们村蔬菜大棚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是这事不能做，因为这样他们村就不能赚钱了，没必要为了遵行县里一个号召就损失村民利益。他的这种反应，如果放在一个受过教育人的身上就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教大家要服从领导、服从组织。但是他没有受过一天教育，他觉得这样一搞，就像戏里说的理由，大家都搞就没法搞了，而且他有勇气去拒绝上面的指示。这东西一方面是智慧，另一方面也跟他成长有关系，在他成长前20年里，主要的苦难来自于政治中胡乱领导，所以也非常震撼我。

我采访他这么多次，他只有讲到身世的时候哭过，他说他当村支书以后这20多年，跟他们家里的冲突是最为剧烈的。为什么？他当了支书以后，按照我们全中国通行的这种规则，我家里有人当官了，家里人要跟着沾光，官大沾大光，官小沾小光，但是他这家里人任何人都别想，坚决不允许，他当支书以后被他兄弟打了30多次。他的这种坚持，也是在我过去接触到的领导干部当中没有过的，他为了维护这个村子里公众的秩序，不惜牺牲跟家人的关系，他的执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卒，因为不管你是高官，还是百姓，你都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心里有一个台词，就是“下棋我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但是生活中没有办法”，因为政策总在变。所以说，必须在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因为只有在法治框架里面才能策划自己的未来，否则的话，我今天坐在这，不知道明天把我弄哪去了，那我不可能把心放在创造好的东西上面，只能用在提防危险上面。在这种大环境下，李连成身上显现的中国人不垮的精神更难得，他的确是这样一步步拱出来的。

电影里李二卒选举的时候向大家保证说：“俺喝大家一盅酒，割舌头；抽大家一根烟，乱花大家一分钱，剁手指头。”这反映了李连成的措施，就是谁跟我最不对付谁来当这个村民监督小组的组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有效，只有最恨你的人才对你最严，他是真的做到了，一直到现在。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何辉教授也谈了观后感，他说：我觉得中国农村本身就有点像卒子，从土改到搞合作社，搞人民公社，期间还穿插着“大跃进”等等，再后来搞乡镇企业，再后来城镇化。这一路过来，中国的农村真是经历过风风雨雨，一开始很多事情弄不清楚，也走过弯路。像片子里的李二卒，一开始就说没有文化，后来他当了支书就开始学认字，他每天四点钟起来翻字典，每天学三个字，这让我觉得很触动。

农村本身就像一个卒子非常艰苦地往前拱，这个棋盘上有帅、象、马、炮，一个个都很轰轰烈烈。但是中国农村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李二卒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真的是该你们城里人吗？我觉得这个话应该是来自农村的人，都会有的想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了一个用牺牲农村去支持城市发展的策略，经济发展到现在，怎么去回馈农村，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城市化大概是54%左右，达到这个标准中国用了30年，英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60年。今后中国的农村发展到什么样？城市化会弄成什么样？如果发展不好可能引发很多问题。

为何会以“卒”来命名并贯穿整片，导演鲁坚给出了这样的诠释：卒是一种精神，代表了尝试和勇气；卒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时代的开路基石；卒也代表了一种态度，是务实与谦逊的表现。随着中国全面改革的深化，新型城镇化的步伐不断提速，无数的“小卒”不断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中走出，开始思考如何让农村成为新的经济效益区，让农村与城市接轨，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地生活。“小卒时代”造就了无数个中国农村发展样本，影片正是捕捉到这个热点，希望通过中国更多的“小卒”去刻画时代的亮点。

（整理人：罗琳）

采茶：中国文化符号

□秦德君

“采茶”是中国农耕社会第五幅文化图景，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

有青山绿水的地方就有茶香，有茶香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茶、可可、咖啡并称世界三大饮料，但茶才是当之无愧的饮界领袖。茶虚静清雅，糅合了佛儒道各家精华，充满了中国滋味和中国精神。

唐人陆羽《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氏教民稼穑，后世尊为炎帝。后人作的《神农本草》中提到茶，故有“发乎神农氏”之说。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伐纣时，茶已作为贡品纳与周武王。中国原始公社后期，茶是货物交换的大宗。战国时期茶的生产规模相当大了。

苍山翠崖，蜿蜒绵延，采茶是中国农耕社会最重要农事之一。“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竿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灌木）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这是农时、物情的讲究。对采茶工具也有讲究：“一曰篮，一曰笼，一曰筥。以竹织之……茶人负以采茶。”天时上“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至于“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这些制茶工序，都须在晴日里完成。

明人高启的《采茶词》描绘了当时的采茶场景：“雷过溪山碧云暖，幽丛半吐枪旗短。银钗女儿相应歌，筐中采得谁最多？”采茶女边唱歌、边采茶，比谁采得快，场面欢快。中国农人心头总有一抹阳光，劳作总有欢声笑语。诗还说：“竹炉新焙未得尝，笼盛贩与湖南商。山家不解种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茶农不种稻黍，以采茶为生，片片青叶是他们民生所在。

采茶是士子隐者的雅事。唐人皇甫曾的《陆鸿渐采茶相遇》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这是有着隐逸趣味的采茶美学。

茶玉润雅厚、碧叶金汤，更是一种哲学、一种道。凡上品茶，必出自艰僻贫瘠、人迹罕至之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它折射着一个民族生存景况和哲学精神。

中国人喝茶，是个大事情。须茶、器、水、境俱佳，并有闲情雅致荡映其间，一树老梅二三枝，四花五瓣开却迟，六壶七盏八方友，九里茶香十首诗。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唐时“茶道大兴。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上自权贵，下至百姓，茶宴风起。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与赵莒茶宴》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茶香与禅意，哪个才是品茗的真谛？宋人杜耒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种喝茶暖暖的，不仅有好友一同围炉，更有半月清辉，一梅暗香。

中国人喝茶不唯解渴，尤为风雅事。《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黛玉、宝钗、宝玉来到妙玉的栊翠庵喝茶，妙玉给了宝玉自己用的绿玉斗，但宝玉似嫌杯小，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妙玉对泡茶的水非常讲究，黛玉问她是不是去年的雨水，妙玉认为隔年雨水没有轻飙浮云之美，“如何吃得”？她用的是5年前在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用青花瓮埋在地下5年后才取出来。

一个不会喝茶的人，是很难领悟到中国文化妙处的。昔日，“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茶是中国士人的一杯心泉，无论戴昺“自汲香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徐祯卿“闷来无伴倾云液，铜叶闲尝字笋茶”，还是郑板桥“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文人们喝的是性灵，是精气神。这种情致，只有在农耕文明的母体里才能孕育。

茶滋润了先民的精神和心灵。如果没有茶，中国人生活是怎样一种干涸场景？

《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用一种“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茶色如雪，名“龙园胜雪”。宋徽宗大悦，郑可简由此官升福建路转运使。

唐代至上世纪50年代的1200多年来，滇藏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一直是汉藏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纽带。它延至尼泊尔、印度，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运茶同时，还有盐、糖、酒、药材、马、骡、毛皮等交易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科学理念等交流。

至于采茶民间艺术，堪为大观。明人王骥德《曲律》记载，采茶歌舞“至北之滥，流而为‘粉红莲’、‘银纽丝’、‘打枣杆’；南之滥，流而为吴之‘山歌’，越之‘采茶’诸小曲……各有其致”。清时“采茶”更盛，清代李调元《粤东笔记》说：“粤俗，岁之正月，饰儿童为彩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燃一宝灯，罩以绛纱……歌十二月采茶。”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把浙江“采茶舞曲”列为亚太优秀民族歌舞加以保护。

无论采茶，还是采桑、采莲、采薇、采菊，都是农耕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瑰意琦行的农耕叙事诗，记录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心灵历史。虽然辽远，却很苍雄。

文化长廊